

沙青 张小燕 张燕京 著

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

——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

目录

第一章 二十世纪
逻辑学方法论的看
法反思

第二章 前苏联二十世纪二十
年代的哲学“清洗”与三十
年代在中国的传播

第三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
逻辑思想论争中的“取代论”
与“兼容论”

第四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逻辑问
题的论争与前苏联四五十年代的逻辑思潮

第五章 逻辑问题上的极“左”思潮与基格尔
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第六章 胡有仪的公开挑战

第七章 胡有仪的“主从说”

第八章 胡有仪的同盟者——王方名与逻辑思想论争

第九章 具有现代逻辑视角的江天骥与逻辑思想论争

第十章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的逻辑论争

河北大学出版社

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

——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

沙青 张小燕 张燕京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仲华

封面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蔡进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 / 沙青、张小燕、张燕京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10

ISBN 7-81028-876-8

I. 分… II. ①沙… ②张… ③张… III. 逻辑史—研究—中国—20世纪 IV. B8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159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 (850mm × 1168mm)

印张：3.5

字数：88 千字

印数：0001 ~ 1000 册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

定价：14.00 元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由于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东西方都曾发生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之争。中国二十世纪哲学战线上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的大论争，从理论思维讲，实质上就是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之争。

科学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重新建构理论思维，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在分析性之精确性前提下的科学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检讨和反思历史就是要促进这种统一，以利科学的现代化。

前 言

回首二十世纪，东方与西方在理论思维上都发生了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之争。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哲学战线上先后两场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的论争，实质上就是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之争。

分析性理性同形式逻辑思维的精确性相关，而辩证理性则同思维的整体性相关。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由于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西方和中国都在对理论思维进行哲学的反思。但反思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是迥然不同的，西方有深厚的科学主义哲学的传统，不管他们如何地批判分析性理性，但是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在分析性的精确性之前提下发展整体论；而中国的儒学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理论思维不易摆脱古代的直觉的笼统的整体观念的影响，习惯于以辩证理性来排斥分析性理性，以政治理性来排斥一切科学理性。虽然倡导辩证法，但又深受黑格尔的消极影响，因此很难达

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纯熟地把他那个时代的辩证理性同分析性理性科学地统一起来的高境界。

辩证哲学的实质是对立的统一，而不是统一的对立。“统一”是核心，是对立的起点，又是对立的目的。任一对立面如果被割裂，被绝对化，它就不是真理；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真理。任何理性作为一个统一体，即已蕴涵两相对立的思想，这种对立通过矛盾斗争达到新的统一，融合成“一个新的思想”。^①近现代众多自然科学的理论，就是这样形成和发展的。辩证理性与分析性理性在分析性之精确性的前提下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逻辑论争中，潘梓年曾提出应当“充分研究”现代逻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二次逻辑论争的前夕，毛泽东也曾对金岳霖说，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但当时均不可能引起社会的注意。本世纪是世界科学与逻辑大发展的时代，而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却只有以金岳霖为代表的极少数先驱者，在极狭窄的天地里，艰难地坚持研究、传播和发展现代逻辑的工作。传统的因袭成为历史的重负，历史在沉思！鉴往识来，今人应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以利科学现代化的发展。

科学的生命在于超越，不超越必没落，科学是不会躺在传统上睡大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参见第103-122页。

目 录

前 言	1
总论——二十世纪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反思	1
一 前苏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哲学“清洗” 与三十年代在中国的传播	14
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逻辑思想论争中的 “取代论”	16
三 潘梓年独树一帜的“方法论”与“技术 论”	20
四 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逻辑问题的论 争与前苏联四五十年代的逻辑思潮	28
五 逻辑问题上的极“左”思潮与黑格尔及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36
六 周谷城的公开挑战	42
七 周谷城的“主从说”	47

八	周谷城的同盟者——王方名与逻辑思想论争	58
九	具有现代逻辑视角的江天骥与逻辑思想论争	83
十	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的逻辑论争	95
结	语	102
后	记	104

总 论

——二十世纪逻辑科学
方法论的哲学反思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促进了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特别是从本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人一直在反思逻辑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而东方由于传统的思维习惯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则较少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科学现代化提上议事日程，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中国人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

“分析性”与“整体性”

科学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而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又将促进现代化的发展。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①

这是爱因斯坦对逻辑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的一个说明。对于他的“惊奇”，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有一个分析。李约瑟以大量资料说明，明代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从方法论上找了原因。他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②但是，阴差阳错，近代科学理论却并未产生于中国，仅就方法论而言，其原因恐怕正在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习惯于直觉的辩证思维亦即笼统的整体思维，鄙视和排斥形式逻辑的分析性思维，而分析性思维的精确性正是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李约瑟所描述的是一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但是，无独有偶，历史常会发生惊人的重复。近一个多世纪，西方一直在致力于现代逻辑科学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古典形式逻辑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弗雷格和罗素建立了形式科学的数理逻辑。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数理逻辑获得了长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74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足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的形式语义学和图灵的图灵机理论，就是当时数理逻辑发展中的里程碑式的成果。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哲学战线正在进行一场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问题的论争。辩证哲学家们都热衷于研究辩证法，而排斥形式逻辑，特别是数理逻辑。潘梓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中曾两次提到：“现在形式逻辑，自己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符号逻辑、数学逻辑等已创造出很严密、很广大的推演方法，以至要把原有的形式逻辑解脱下来，称之为古典逻辑或传统逻辑而遗置一旁。这，我们一点也用不着去反对。只要我们有本领去运用，它那谨严的技术，对于我们是很有用的。”“符号逻辑、数学逻辑的非常巨大的发展是形式逻辑演绎法的一个新的进步，应当予以充分的研究。”^①但当时，它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场逻辑论争，人们的兴趣仍在辩证法（辩证逻辑）方面，根本没有接触到现代逻辑。1956年1月，在那场论争的前夕，毛泽东曾对金岳霖先生说过：“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②这显然是针对前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中反对现代逻辑的观点的，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根深蒂固，毛泽东

① 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三联书店1961年版，《弁言》及第68页。

② 《理有固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的观点也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注意。他自己后来也没有再提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现代化发展的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向，促使许多西方科学家由分析性思维转向整体思维。西方科学思想界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了一股批判分析性思维（或称“分析性理性”），倡导整体性思维（或称“辩证理性”）的热潮。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描绘了当代理论思维的这种转向：

第二次浪潮文明特别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成各部分的能力，而对把各个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时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是这样的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

而他后来在为普里戈金和斯唐热的《从混沌到有序》所写的《前言》中一开始又强化了 this 思想：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李约瑟认为这种“拆零”的“原了论式”的机械观是一种“典型的欧洲痴呆病”。而美国的弗里乔夫·卡普拉对这种思维方法也认为是一种“阳盛阴衰”的“西方病”，应该转向东方整体性观念。^①

中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周易热”可能与西方的这种批判分析性理性的思潮相关联。但是，难道当代的理论思维会复归到古代的那种直觉的辩证思维或笼统的整体思维而注定要排斥分析性思维吗？看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分析性思维，乃是“东方”的一种顽症。

“逻各斯”与“隐喻思维”

西方理论思维的“转向”，也与当代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变化相关联。西方哲学一直存在着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争，前者属科学主义学派，后者属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学派。分析哲学强烈反对传统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反对神学形而上学干扰科学。它一般不研究本体论的问题，而崇拜实证科学，主张用精确的科学模型来改造哲学。它的特征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它所重视的是建立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科学的方法论。人文主义也强烈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与科学主义是相同的。但人文主义重视

^① 见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四川科技出版社。

本体论，它以认识的主体——人为本体，而不以人的感性存在或理性存在为本体。人文主义以人的非理性意识，如意志、生命、情感、本能、欲望等为本体；把哲学的方向从外部世界引向内心世界，并由此出发去解释外部世界。在方法论上，它反对逻辑主义的方法而主张用直觉、内省等非理性来阐释人的内心世界。这种方法是“以隐喻思维”，或者说是以直觉思维为中心的。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同中国人一样，一直在反思他们的文化传统。当代西方出现一种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哲学转向”的新潮流。当代中国受传统哲学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人文主义思潮流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弱。国内外的这种哲学潮流的动向，必然对理论思维方法产生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西方哲学的主流——分析哲学历来是把逻辑思维方式当做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甚至生存方式来看待的。西方文化的一般传统也正是以此为根基的。人文主义哲学则对此提出了挑战。德国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一书提出：神话，并不是按照逻辑思维方式行事的，而是“隐喻思维”的方式，这种神话的隐喻思维实际上乃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因为“语言”这一人类思维的“器官”，就其本质而言首先就是隐喻的（语言与神话相伴才发展起来），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和抽象概念实际上是在神话的隐喻思维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发展。卡西尔认为“逻辑的（推演性的）和神话——语言的概念发展”各自所循的“方向”是不同的，逻辑思维“从某个个别的单一知觉开始，我们把这一知觉放入

越来越多的关系中去观察它……这里所牵涉的理智过程是一个综合性增补过程，亦即将单个的事例结合到整体之中，并使之在整体中完满的过程。”“它嵌入现象的整体，但却作为某种独立的单个的东西与其他现象保持着一定距离。”而隐喻思维则是“心灵的前景被‘蒸馏’到只剩下一点。而只有通过这一蒸馏过程才能找到特殊的本质，才能把它提取出来”，隐喻思维的基本原则就是“部分代替整体”，“整体的每一部分就是整体本身；每一个样本即等于整个的种。部分并不只是表象整体，样本也不只是反思思维的媒介辅助物，而实际上包含了整体的力量、意义和功效的真正的‘在场’。”^① 卡西尔批评形式逻辑思维使“个别”独立的游离于“整体”，这种分析性思维不能把握“现象的整体”，这有其正确的一面；而他企图以“心灵”的直觉这种“隐喻思维”去把握“整体”却并非是唯物的科学的。但卡西尔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人类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方法。

欧陆人文哲学的主张，就是要把哲学从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从逻辑方法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而其入手处就是“语言”。这就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语言的转向”。英美分析哲学是要不断地提高语言的逻辑功能，它们所要求的是概念的确定性、表达的明晰性、意义的可证实性；而欧陆人文哲学恰恰是要竭力地消解语言逻辑功能，它们所要求的是词语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要

^①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参见第107~109页。

而言之，即是要把语言从逻辑法则的“压迫”下解脱出来。这一思潮冲击着英美分析哲学。但应注意，当代欧陆人文哲学并不认为存在什么“非文字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伽达默尔有一句名言：“可以被领悟的存在就是语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他们所主张的则是对语言的心灵的直觉思维的分析，即对语言文本分析。因此，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随意性。

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各自把一个侧面绝对化，但科学家终会在现代科学的思维的基础上融合两者的合理因素。不管怎样，西方现代化科学的发展，最终只会建立在科学主义的合理的基础之上，而不会退回神秘主义；而那些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的逻辑科学方法论的合理内容也是不可能被否定的。

西方哲学向人文哲学的“转向”，使得有些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古代的阴阳说、中国的方块字颇为赞赏。

一九八二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弗里乔·卡普拉的新著《转折点》在英美同时问世，颇受注意。这本书是讲方法论的旧观念与新观念、旧规范与新规范间斗争的。卡普拉用现代系统论来重新赋值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并用这个文化框架对“西方病”做出“阳盛阴衰”的诊断。他认为，西方文化历来偏重于阳，竞争重于合作，理性重于直觉，分析重于综合等等，而现在这种阳盛阴衰已经达到阳极而阴的转折点。而德里达在《论书写学》中，则以为中国的非拼音文字具有“超乎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优点，天

生的富于隐喻性。

其实，卡普拉所谓的“阳极而阴的”转折，也绝不是要转到中国古代的阴阳逻辑中去，他是以现代整体观念来阐释阴阳学说的。而语言文字的形成与其逻辑功能是同步的，非拼音文字并不例外，语言的逻辑功能是不需要也是不可能被排斥的。确实，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大优点是整体的综合性，而汉语易于张大词义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表现的多功能性，也非常适于这种整体性思维的传导。但由此也带来一个严重缺陷，即忽视和轻视分析性的逻辑思维。而后的精确性和明晰性正是现代的整体性综合思维得以发展的前提——在古希腊和东方传统思维的那种直觉的模糊的笼统的整体性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现代的科学理论思维方式的。人文主义哲学所要求的直觉思维虽带有整体性，但它的发展绝不会复归到古老的直觉思维。

现代的“整体性”观念与 “分析性”观念的统一

现代科学的“整体性”观念区别于古代的“整体性”观念的一个本质特征，除了整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整体的性质不能还原为部分的性质之外，还在于它是与分析性思维的精确性为基石的，而古代的和人文哲学的整体观念则是排斥分析性思维的。

二十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的系统科学集中体现了现代的“整体性”观念的特征。系统方法、结构主义方法、耗散结构论、混沌理论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整体